

## 《埤氏实践教育学》的传播及其 在我国教育学发生发展中的意义

石 鸥，车迎新

**摘要：**《埤氏实践教育学》由京师大学堂出版，时间应是1902—1903年，作者是德国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迪特斯（Friedrich Dittes）。该书首先由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引入日本，接着依据日文版再翻译成中文，引入中国。该书是我国教育学建制进程中最早的教育学教材之一，它明确并列使用了体育、智育、美育与德育的概念，并系统展示了其基本内容，为我国教育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架构与逻辑思路，奠定了我国早期师范教育甚至百年来的师范教育的内容基础和关键路径，为高水平的师范教育教材体系的形成指明了方向，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学术资源。

**关键词：**《埤氏实践教育学》；京师大学堂；弗里德里希·迪特斯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2-0150-09

笔者最近在策划一场百年中国师范教育教材展时，对一本《埤氏实践教育学》（见图1）发生了兴趣。看着这古朴庄重、粗壮有力、线条硬朗的字体，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初步查阅后，尚未发现与此书有关的直接研究，也几乎没有有价值的资料。那么，这本教育学著作作者是谁？哪个国家的？什么时候由谁引进中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考证”工作开始了。

### 一、《埤氏实践教育学》及其日文本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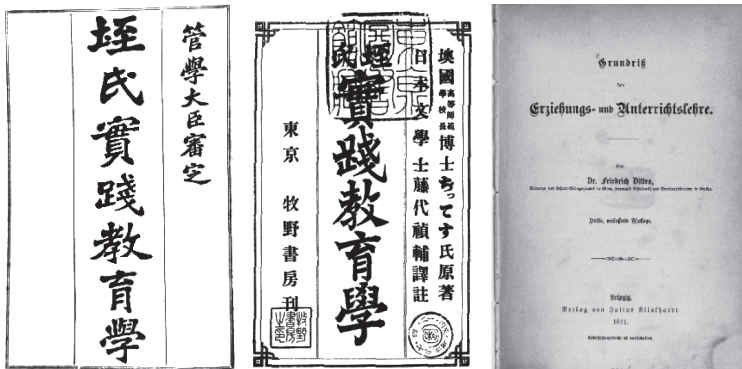


图1 《埤氏实践教育学》各版本封面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特色教育学教材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时代创新研究”（2023M742041）。

**作者简介：**石鸥，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车迎新，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 （一）中文版《埤氏实践教育学》

我们收藏的《埤氏实践教育学》中文版，线装直排。扉页显示：管学大臣审定。当时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再查译作者，是中岛端。

中岛端（1874—1947），号斗南，日本近代重要的汉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积极投身日本的思想界与舆论界，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在当时日本对外扩张、妄图染指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大背景下，中岛端<sup>①</sup>曾到中国游历考察，机缘巧合之际参与了上海译书分局的翻译工作。中岛端和罗振玉、王国维皆有交集，与罗振玉的联系比较密切，曾经为罗的《教育世界》当翻译，引进日本和西方的一些教育新说。比如为《教育世界》翻译了教育小说《爱美耳钞》（即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的《爱弥儿》，山口小太郎、岛崎恒五郎译，中岛端重译）、教育著作《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即《赫尔巴特派教育》，由美国德加谟1895年出版的《赫尔巴特与赫尔巴特学派》转译）等。罗振玉则为中岛端著的《斗南存稿》一书撰写过序言。

晚清学界之所以频频请日本学者翻译引介西学，当与清政府教育主管者的认识密切相关，也基于我国外语人才和对现代学问体系有研究的知识分子匮乏这一背景。而且当时很多西方的学术著作已经先被日本翻译引介，日文版更便利引入中国。另外，部分日本人对汉学也有一定基础，懂中文。孙家鼐在《代梁启超奏译书局事折》中提到“此次办理译务，拟先聘日人先译东文”“查中国向来风气未开，中西兼通之人实不多观，故前者间有译出之书，大都一人口授一人笔述，辗转删润，讹误滋多。故举人此次办理译务，拟先聘日人先译东文。因日本人兼通汉文、西文之人尚多，收效较速”。<sup>②</sup>《埤氏实践教育学》的译者选择日本学者中岛端想必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事实上，当时很多西学都是经由日本人由日文版翻译成汉文的。如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1902年译成的五本书全都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木鹰村太郎之《东西洋伦理学史》，穗积八束之《国民教育爱国心》，佐藤传藏之《中学矿物学教科书》，藤代祯辅之《埤氏实践教育学》，清水直义之《实验教育行政法》内职员儿童篇、立法司法外政篇。<sup>③</sup>

当然，也有一些日本人的翻译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东文书籍名词既多生涩文字，又复晦滞，译者每托辞于惧失原意，以自文其谢陋以故，每校一稿，非经三四过不能妥适”<sup>④</sup>。于是，每个日本译者多配有中国学者负责“校对”，实际上就是润色，甚至是协助、合作翻译。《埤氏实践教育学》的校订者或合作翻译者是曾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的教习陈黻宸。陈黻宸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史学家，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

<sup>①</sup> 中岛端回日本后，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言论，对中国的国情、社会状况等发表了诸多看法，其中夹杂着日本想要干涉中国、从中国谋取利益等不良居心。

<sup>②</sup> [清]孙家鼐：《孙家鼐代梁启超奏译书局事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91页。

<sup>③</sup> [清]张百熙：《上海译书分局为开办情形呈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93页。

<sup>④</sup> [清]张百熙：《上海译书分局呈大学堂译书稿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486页。

子”<sup>①</sup>。先后任学部京师编译局总纂、京师译学馆教习及旅京浙学堂正总理。陈黻宸协助中岛端完成《埤氏实践教育学》时，他自己正在京师大学堂师范科任教习，《埤氏实践教育学》理所当然成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科的重要教材。

经进一步考证，该书中文版翻译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出版。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三个多月后的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902年8月30日），上海译书分局呈报了第一批译书书名及著译人姓名名单，其中已经译成的书有五本，尚有一批计划翻译。译成的5本书中包括中岛端翻译的藤代祯辅的《埤氏实践教育学》。<sup>②</sup>该书翻译工作历时三月有余基本完成，但校对工作量很大，因“东文书籍名词既多生涩文字，又复晦滞”“每校一稿，非经三四过不能妥适”<sup>③</sup>，最终译稿于五个月后才定稿，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呈送至大学堂，是年由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出版发行。<sup>④</sup>

文献记载表明，上海译书分局呈送大学堂的《埤氏实践教育学》的译稿共五册。<sup>⑤</sup>有意思的是，我们收藏的《埤氏实践教育学》仅为两册装，其主要内容与其母本——日文版完全一致，并未发现结构性缺漏，也是80章，应该两册即全本，与史料所记载的五册有所出入。也许是预计五册，实际最终出版时合为两册，或者还有一种新的尚未发现的版本。

## （二）中文版《埤氏实践教育学》的母本——日文本

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多次提到，在1902年译成的五种书中，包括日本学者藤代祯辅的《埤氏实践教育学》，这是中文版《埤氏实践教育学》的母本。这样，进一步了解藤代祯辅以及他的《埤氏实践教育学》就成为逻辑的必然。

不难发现，藤代祯辅并不是《埤氏实践教育学》的著作者，而是日文版的翻译者。真正的母版是德文版，该书原作者是德国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迪特斯（Friedrich Dittes）。该书由藤代祯辅从德文原版翻译成日文，并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三月由日本牧野书房出版。弗里德里希·迪特斯原书名是《教育和教学的基础》（*Grundriß der Erziehungs- und Unterrichtslehre*），藤代祯辅将它的主要内容翻译到日本时，将《教育和教学的基础》原书名改为《埤氏实践教育学》。“埤氏”之“埤”，当是迪特斯（Dittes）的音译。至于为什么改为

① 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晚年改名芾，浙江瑞安人。陈黻宸与陈虬、宋恕并称为“东瓯三先生”，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享有盛名。光绪五年（1879年）在自家设颖川家塾，后先后在永嘉罗山、平阳龙湖、乐清梅溪、乐成诸书院任教，培植家乡子弟，历时20年。其教学重在启发诱导，诲人不倦，声誉卓著，故生徒闻风而至，书院人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宋恕推荐他任天津育才馆教习，《荐字》介绍：“癸巳（1893年）科举人”“品行极优”“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文似黄河、长江，不饰门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上海速成教习学堂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杭州养正书塾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生学潮，率学生马叙伦等数人离校，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著有《经学大同说》《独史》《德育》《地史原理》等文，尚书张百熙叹为“一代绝作”。1902年校订完成《埤氏实践教育学》，后历任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教习、学部京师编译局总纂、京师译学馆教习及旅京浙学堂正总理。

②〔清〕张百熙：《上海译书分局为开办情形呈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93页。

③〔清〕张百熙：《上海译书分局呈大学堂译书稿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486页。

④⑤ 中华民国教育部：《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周邦道、黄问歧、李公明等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开明书店1934版，第118页。

“实践教育学”，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该书于明治三十年（1897年），由日本博文馆重新出版。

藤代祯辅（1868年7月—1927年4月），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教育家和教育改革者，是明治至昭和时代前期的德国文学研究者，也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第一位教授。他出生于千叶县，笔名为藤代素人。藤代祯辅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后，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学习两年，明治三十五年归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教授。藤代祯辅在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张借鉴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制度，推动日本教育的现代化，尤其在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藤代祯辅也被认为是日本德国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对日本德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贡献。藤代祯辅还曾与卡尔·弗洛伦茨共同进行《万叶集》的德语翻译工作，但该工作在他去世时未能完成。他在1926年被授予日本国家荣誉体系之从三位的位阶，并在1927年去世时被追赠正三位的位阶。<sup>①</sup>

藤代祯辅翻译的《埤氏实践教育学》，和德文原版的最大不同是删掉了原版书中的第六部分——宗教。这一部分共三篇：宗教的本质、宗教教育、宗教教学。出于日本教育实际和发展的需要，果断斩断宗教进入日本教育界的举措应该是有远见的。藤代祯辅在日文版例言中对此进行了说明：“书中所论，间有关于宗教教育者，我邦情形，大与彼土不同，于此尽删去之。”<sup>②</sup>

经校对比较，中文版的《埤氏实践教育学》忠实地译自日文版的《埤氏实践教育学》，与日文版《埤氏实践教育学》不论是结构上，还是基本表述上都高度一致，结构上无宗教部分。中文版的翻译似乎没有参照德文原版，仅仅以日文版为母本。

## 二、“埤氏”与他的《教育和教学的基础》

中译本只有日译本译者藤代祯辅所写的“撰写例言”和原德文作者所写原“序”，并无研究者所谓的校对者陈黻宸所写的“序”。<sup>③</sup>由译本的“撰写例言”可知，该书原作者为“埤斯弗勒特力”“以西历1829年9月23日生独逸国索逊州伊耳比耳斯格绿温。及长，游莱弗知卑大学，卒业后，从事教育”。<sup>④</sup>

人名、国名、地名显然是音译的，有点费解。“独逸国索逊州”实为“德国萨克森州”，“独逸国”即德国“Deutschland”的德语读音。而“索逊州”即“萨克森州”（Sachsen）。经多方考证，《埤氏实践教育学》的原作者“埤斯弗勒特力”实为后来习惯翻译的弗里德里希·迪特斯（Friedrich Dittes，为行文简便，本文多称“迪特斯”）。“莱弗知卑大学”，即“莱比锡

① 日本的位阶等级划分起源于古代的冠位十二阶，后来发展为律令制下的位阶体系，其中包括亲王和臣下的位阶。明治时代，位阶制度被重新恢复并简化为从正一位到从八位的16个等级，扩大了授位对象，无论华族还是普通民众，只要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值得表彰的功绩，均可以授予位阶，从四位以上享受华族礼遇，从一位相当于公爵，正二位相当于侯爵，从二位相当于伯爵，正三位相当于子爵，正四位相当于男爵。1926年的“位阶令”进一步将位阶纳入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明确位阶只授予日本国民，且一旦失去日本国籍，所授位阶也会失去。这一制度体现了日本对个人功绩的认可，是日本国家荣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 [日] 藤代祯辅：《例言》，[日] 中岛端译，陈黻宸校：《埤氏实践教育学》，京师大学堂官书局1903年版，第3—4页。

③ 张小丽：《“德育”“智育”“体育”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考论》，《教育学报》2015年第6期。

④ [日] 藤代祯辅：《例言》，[日] 中岛端译，陈黻宸校：《埤氏实践教育学》，京师大学堂官书局1903年版，第3—4页。

(Leipzig) 大学”。莱比锡大学位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创立于1409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仅次于海德堡大学（1386年）。

沿着这些线索往下考证。原作者“埵斯弗勒特力”或“弗里德里希·迪特斯”1829年9月23日出生于德意志邦联萨克森王国（Königreich Sachsen）的一个村庄Irfersgruen，1896年5月15日逝世于奥地利维也纳。<sup>①</sup>目前已知关于他的相关信息中，其国籍显示为奥地利。事实上按照其出生地看，迪特斯应该算作德国教育家，只是他的部分教育活动是在今天的奥地利展开，在奥地利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迪特斯的教育生涯开始于1844年，是年他进入了位于普劳恩（Plauen）的教师培训学校学习，并在1848年毕业后成为莱辛巴赫（Reichenbach）公立学院布尔格学院的教师。1850年迪特斯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自然科学和教育学。从1853年起，他成为普劳恩市民学校的教师，并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在业余时间自学语言和哲学，特别是爱德华·贝内克（Eduard Beneke）<sup>②</sup>的心理和教育作品。1858年又返回莱比锡大学继续他的学业，186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成为开姆尼茨（Chemnitz）实科中学（Realschule）<sup>③</sup>的副校监。他在1864年的“全德教师大会”上因公开批评当时的学校状况而受到关注。1865年，他被任命为哥达城（Gotha）<sup>④</sup>的学监。1868年至1881年，他担任维也纳教师培训机构Pädagogium<sup>⑤</sup>的首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Pädagogium成为了教师培训的重要机构。在1870年至1873年，迪特斯成为下奥地利州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在1873年至1879年担任了帝国议会的成员，在那里他特别致力于公立学校系统的发展。

迪特斯是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和第斯多惠（Diesterweg）的追随者，他在教育方面的工作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为维也纳的学校系统作出了特别的贡献，推动了学校系统的自由化，被认为是继第斯多惠之后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教育家。迪特斯主张建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外部宗教和政治影响的学校组织，持严格的反教派立场（有意思的是，他的《教育和教学的基础》一书，却用了不少篇幅论宗教和宗教教育）。自1873年以来，他多次为教会和学校系统的自由组织进行有力而成功的呼吁。

在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同时，迪特斯还根据自己的教育工作经历与研究心得撰写出版多部教育著作，包括《教育和教学的基础》（1868年）、《教育和教学的历史》（1871年）、《实用逻辑教科书》（1872年）、《心理学教科书》（1873年）、《心理学和逻辑学教科书》（1873年）、《维也纳市教师教育学院》（1873年）、《基于历史的国民学校教学法》（1874年）、《教育学学校》（1876年）等。从1878年开始，他负责编辑出版*Paedagogium*（可以译为《教育场所》或《学校》）月刊，该刊物旨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内容，并且很快因其内容的深度和严肃性而获得

① 在考证该书作者的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彭正梅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② Eduard Beneke（1798—1854），全名Friedrich Eduard Beneke，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于1798年2月17日出生于柏林，并在柏林和哈雷的大学接受教育。最初，Beneke学习神学，受到Schleiermacher和De Wette的影响，但后来转向了纯哲学，特别关注英国作家以及对康德主义进行修改的德国思想家，如Jacobi、Fries和Schopenhauer。

③ 实科中学也称实验中学（Realschule），是德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种中学类型，主要针对中等程度的学生，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介于职业预科（Hauptschule）和文理高中（Gymnasium）之间的教育选择。

④ Gotha是德国图林根州中部的一个城市，位于爱尔福特以西24千米处，坐落在图林根林山的北麓。

⑤ 由维也纳自由市议会创建的教师培训机构。

了领先地位,直至迪特斯去世前,他仍负责该刊物的编辑工作。

迪特斯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影响了奥地利和德国的许多教师。他的非教派信仰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去世后,被安葬在维也纳新教墓地 Matzleinsdorf(第14组,第4号),其墓碑在1900年9月23日揭幕。维也纳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迪特斯街”(Dittes-gasse)和“弗里德里希·迪特斯街区”(Dr.-Friedrich-Dittes-Hof)。<sup>①</sup>

今日译本《埤氏实践教育学》原版为迪特斯在1868年出版的《教育和教学的基础》。此书多次再版。至少有1871年、1874年、1877年版本。目前在德国可以检索到的最早版本是1871年出版的。1877年莱比锡克林哈特出版社(Klinkhardt)出版的是第6版,德国国家图书馆和巴伐利亚图书馆都有收藏。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有1874年版的《教育和教学的基础》德文版。

迪特斯希望通过该书帮助教师,“资其研究,以为入门之基,而为日常口头所教授、所启发一切教育要领”,因而其内容实操性强。迪特斯撰写此书时不仅基于本校教师需求,还将目光放到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提出“余又非将国民教育为一专门家事业者,苟有贤良之父母,聪明之人士,留意于公共学问者,不论阶级,不问职业,一读是书,必有所得”。<sup>②</sup>也正是源于这样的期待,迪特斯在撰写此书时“撰择最致意,虽片言只句,非经反复商量不载也”<sup>③</sup>,比如在撰写体育篇时会向优秀的医生求证等。由于迪特斯在撰写该书时“下足了功夫”,因此该书当时一经出版,“各国争译而传之,版经七易,每易版辄经订正补修。今盛行于欧美各国矣”。<sup>④</sup>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大量翻译引进了一些德国的学术思想和科技成就。其中就包括这本由藤代祯辅翻译并取名的《埤氏实践教育学》。藤代祯辅还将迪特斯的《心理学教科书》翻译引进到日本,其日文出版名称为《埤氏心理学》(1898年,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此外,迪特斯的《实用逻辑教科书》则由另一位日本译者岩田岩次郎翻译,并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12月出版,日文版书名改称为《埤氏论理学》(1896年,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由此可见,迪特斯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被日本知识界广泛认同。

### 三、《埤氏实践教育学》的内容与意义

迪特斯的德文原版书名《教育和教学的基础》,有原序,藤代祯辅翻译版翻译了原序,同时写了“例言”,对迪特斯作了简要介绍。除了充分肯定迪特斯的从教经历与教育成就,特别指出他“属倍热杰派,与皮耳婆耳土派所见特异”“生平教育方法,私淑皮斯太禄秩、慈斯底耳越卑二氏”。<sup>⑤</sup>

从目录看,迪特斯的德文原版《教育和教学的基础》共七部分90章:第一部分体育,第二部分精神生活,第三部分智育,第四部分情感培养和美育,第五部分德育,第六部分宗教,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迪特斯街区”是位于维也纳第19区Döbling的一个社区建筑,这个建于1928年的建筑群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德国教育改革家Friedrich Dittes而得名。在建筑的内部庭院中,有一个Friedrich Dittes的浮雕肖像。

<sup>②③</sup> [德]弗里德里希·迪特斯:《埤氏原序》,[日]中岛端译,陈献宸校:《埤氏实践教育学》,京师大学堂官书局1903版,第1—2页。

<sup>④</sup> [日]藤代祯辅:《例言》,[日]中岛端译,陈献宸校:《埤氏实践教育学》,京师大学堂官书局1903版,第3—4页。

<sup>⑤</sup> 以上均见译自日文的中文版的《例言》,经多方考证,结合日语发音,“皮斯太禄秩”应为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慈斯底耳越卑”应为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Diesterweg);“皮耳婆耳土”,根据日文版的翻译,此人应是赫尔巴特(Herbart);这里的“倍热杰派”,根据日文未能找到相关线索,不能确定其是人名还是派别名称。

第七部分教育的整体。

日文版以《埤氏实践教育学》之名取代了《教育和教学的基础》书名，同时略去了德文版第六部分宗教的10章，其他不变，共80章，涵盖在六大部分中。

中文版《埤氏实践教育学》和日文版的高度一致，也没有宗教这部分的内容，从目录看，都是80章，分布在六大部分。

经初步比较，中文版的《埤氏实践教育学》第一部分体育共20章，第二部分精神生活共5章，第三部分智育共24章，第四部分情感培养和审美教育8章，第五部分德育18章，第六部分教育的整体共5章。

第一部分“体育”。三种文字版本一致，都是20章，内容不完全是今天的体育，不全是体育运动意义的体育，实际上包含着很多身体健康与疾病预防的内容，有点类似于体育与健康，但今日之体育与健康中的健康，多讲心理健康，而百年前的这个体育与健康，则主要是身体健康。所以从内容上看，严格说应该译为“身体教育”，日文版及中文版则直接译为“体育”。除了绪论外，体育包含五篇：论营养、论呼吸及皮肤之保养、论运动及休息、神经及觉官之动作、论疾病。运动意义的体育集中在第三篇论运动及休息，含5章。这5章也不全然是运动的体育，还包括睡眠等休息内容，真正涉及现代体育运动的是其中1章，主要讲体操，章标题为“论有意运动之教导（即体操）”。这是中国最早系统使用“体育”概念并赋予“体育”具体内容系统的教育学教材。在整本教育学中，“体育”这一部分篇幅（20章）仅次于“智育”（24章），但“体育”设在开篇，是整个“教育学”之第一部分，说明《埤氏实践教育学》对体育的意义与价值的凸显。

中文版第二部分是“精神生活之通观”，日文版同，德文原版是精神生活。这一部分有5章内容，主要涉及精神与身体的关系：论精神发达及身体发达之关系、论心像之结合及感情、论精神之发达由普通及特殊赋性而规定其范围。日文版和中文版章标题基本一致，只是没有“论”这个字。

中文版第三部分是“智育”，日文版同，德文原版是“意志和行为的教育”。三种文字版都含24章，分属三篇，在所有各部分中，本部分章数最多。中文版三篇分别为：论教育上考察（德文版：教育学观点；日文版：教育学上之考察）、论普通教育法、论国民学校（小学校）教授通则。第一篇“论教育上之考察”，相当于概述，内含论智育之价值及其本质等6章；第二篇“论普通教育法”，包括记忆力、注意力、思考力等内容，近似于今日之心理学部分；第三篇“论国民学校（小学校）教授通则”，含教材、教育方法、教学过程、教学形式、教学手段等内容，近似于今日教育学之课程与教学论部分。

第四部分中文版“论情育和美育”，日文版“情育和美育”，德文版“情感培养和美育”。该部分没有分篇，共8章。“情育”在今天看来是个陌生的教育词汇，而在晚清，则在学界使用还是比较常见的，后面将有专门论述。从内容看，主要涉及情感培育，包含论心情之本质、论心情之重要及其审美之修养、论情育之必要限界（范围）、论情育问题、论情育自然之起源及情育关系、论情育之特别整理、论美育、论对情育美育之学校本务。涉及心情的重要性、情感培育的意义、美育、学校在培育情感和审美中的作用等内容。

中文版第五部分“德育”，共18章，自第58章到第75章。三种文字版本章数一致，表述

也基本一致。全书分量排第三,仅次于智育(24章)与体育(20章)。内含论处世原理之建立、论趋向之准则、论意志行为之指导三篇。其中“第一篇论处世原理之建立”含:论伦理之本性,论伦理之误谬与义务、良心、德行、道义之自由志操,论德育之问题及其评价,论道义之价值及其构成;“第二篇论趋向之准则”包括:论反求自善之趋向,论名誉心之养成,论预防我见,论养成爱敬之心,论妒忌之预防;“第三篇论意志行为之指导”包含:论意志之本质,论意志修养之主则,论行为之诱掖,论欺瞒窃盗失行之预防,论顺从之育成及专横执拗,论赏罚,论伦理之训诲。显而易见,其中不少内容仍然是当代德育的重要研究内容。

中文版第六部分教育通论(德文版是第七部分,因为第六部分是宗教,被日文版和中文版删除),从76到80章,共5章。相当于教育学的概论部分,包含:论教育之本旨,论教育手段,论教育方法,论子弟及其种类(学生及其差异),论教育者及其教育所(教育者和教育机构)。

由上可见,《埤氏实践教育学》在我国早期教育学和教育理论发展以及教师教育教材系统中具有重要意义,不能遗忘。

第一,系统提出了德智体美育的概念并赋予具体内容。这本《埤氏实践教育学》应该是我 国教育学建制进程中最早的教育学教材之一,它明确并列使用了体育、智育、美育与德育的概念,并系统展示了其基本内容,为我国教育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架构与逻辑思路,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学术资源。目前的文献看,德智体美育独立而系统进入中国教育学界,1902—1903年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年。

第二,注重“情育”。值得关注的是,《埤氏实践教育学》把美育与“情育”(情感教育)连接甚至等同起来的认知。“情育”也叫情育论(theory of emotional nurture),也称为“情感教育论”,主张美育就是情感教育的理论。美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和美的形式来陶冶和培养人的情感,使之达到高尚和愉悦的状态。一般认为,“情育”概念在中国最早是由王国维提出的。王国维是中国现代性美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将教育分为智育、德育和美育三个部分(此文没有提及“体育”,他1901年引入的《教育学》也没有“体育”),并指出美育即情育,作出了“美育,即情育”的定义,指出美是人的精神产品,具有超物质性、超利害的关系和超时空性。<sup>①</sup>《埤氏实践教育学》正好是1902年前后引进中国的,在日本出版更早。日译本使用的就是“情育”概念。曾经留学日本的王国维应该接触并接受了这一概念。<sup>②</sup>120多年前“情育”的提出,本具有重要价值,遗憾后来被人们慢慢淡忘了。直至今日,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才被学界广泛关注。尽管情育更侧重于情感的培养和管理,关注个体情感的健康发展和情感关系的建立,而美育更侧重于审美能力的培养,关注个体对美的感知、理解和创造能力的提升,但情育和美育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的。美育可以通过艺术和美的形式来陶冶和培养人的情感,使情感达到高尚和愉悦的状态;而情育也可以为美育提供情感基础,使个体在情感上更好地接受美、欣赏美。

第三,为我国早期教师教育作出了贡献。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变法图强之

①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版,第32页。

② 1901年2月,25岁的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现东京理科大学)学习,4月因病返国抵沪,这是他第一次到日本。1902年5月3日王国维从上海启程往日本,5月5日抵长崎,5月7日抵神户,6月12日回国,这可能是第二次去日本。

本在兴学堂、在新教育。要办新教育就要有新教师，我国的师范教育由此开端，在西学东渐和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南洋公学师范院、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等师范院校应运而生。由于现代意义的师范院校建设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其课程设置的教材编写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只得借鉴西方经验。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师范馆各科课程“均用译出课本”，即使用翻译引进的教材。因此近代以来翻译的教育学著作和讲义，如英国斯宾塞著《教育论》、法国卢梭（法国）著《教育论》等，就成为各类师范学堂的重要“课本”。而我们手中的这本《培氏实践教育学》，从1868年首次出版到1902年经由日本转译进入中国，跨越了整个亚欧大陆，从欧洲教师的手中，“传递”到了我国最早一批师范生手中，在清末“新政”的风潮中，为我们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师范院校建设和早期师范教育教材开发提供了“范本”，为我国早期师范院校的发展、师范生的培养和师范教育教材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该书奠定了我国早期师范教育甚至百年来师范教育的内容基础和知识框架，为高水平的师范教育教材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不能遗忘，也不该遗忘。

（责任编辑：李 哲）

### Dissemination of *The Practical Pedagogy of Ditt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China

Shi Ou, Che Yingxin

**Abstract:** *The Practical Pedagogy of Dittes* was published by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likely between 1902 and 1903 and the author was German educator Friedrich Dittes. This work was initially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by Japanese scholars and introduced to Japan, and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ased on the Japanese version and introduced to China. As the earliest pedagogical textbook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dagogy in China, it explicitly employed the concepts of physical, intellectual, aesthetic and moral education, presenting their fundamental content. The book has provided essential academic framework and logical approach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China,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tent and pathway of early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even for normal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pointed the way for high-quality normal education textbook system. In a certain sense, it has also served as important academic resource for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education, aesthetics, and labor in China.

**Key words:** *The Practical Pedagogy of Dittes*;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Friedrich Dittes